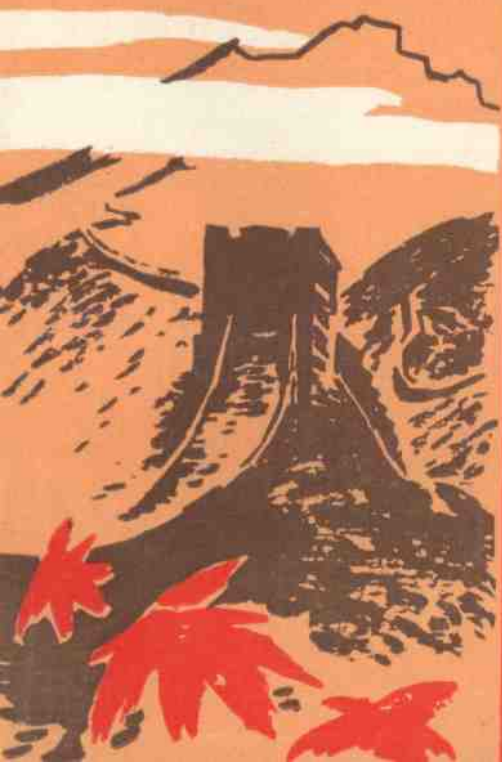


因为我是中国人

钱学森等科学家回国纪实

陕西人民出版社

华心编



因为我是中国人

——钱学森等科学家回国纪实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因为我是中国人

——钱学森等科学家回国记实

华 心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插页 80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4-01062-6/I·235

定价：2.55元

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代序）

钱 学 森

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国际理工研究所今年授予我奖章和称号，说是表彰我“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我想这里面“中国”两个字是不可缺少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回想起来，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到这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一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到1950年，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到祖国去。但是美国的统治阶级与中国人民为敌，制造了种种麻烦，阻止我回国，使我多呆了5年。我清楚记得，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

开始，王炳南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会谈。他按照周总理的旨意，与美方代表进行了交涉和斗争，于是我在8月5日即接到美国政府的¹通知，说我可以回国。当然，我是作为美国的犯人，被驱逐出境，押送回国的。一路上我不能下船，因为一下船，美国政府对²我的安全就不负责任了。这一段历史，我决不会忘记，它使我深深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我也领教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深知美国的“民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深厚感情的。记得船到马尼拉，有一个美联社记者到船上来找我。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的回答是：

“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呢！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他听了回答，没敢再问第二个问题，灰溜溜地跑了。

回到祖国以后，我感到欢欣，希望早日投入工作，但领导上让我先到各地看看。开头是去东北，到哈尔滨参观军事工程学院。当时的院长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回哈尔滨接见我。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陈赓大将说：“好！就要你这一句话。”谁知这一句话，决定了我这一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冒说一句可以搞导弹，但是真正干起来，困难真多呀。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从经济到技术，各方面的条件与现在比，相差是很远很

远的。然而，原子弹、导弹，这两项尖端技术终于被我们攻克了，而且是以很快的速度搞成的。原因何在？我认为，最最重要的原因，是党的领导。具体地说，就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和聂荣臻元帅的具体组织。我们在座的同志都怀念那个时代。按照我的体会，周总理、聂老总就是把他们过去在解放战争中组织大规模作战的那套办法，有效的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所以，尽管我们在经济、技术上有许多困难，但由于组织领导有方，还是很快搞成了。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觉得，个人只是尽力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那是很有限的。要说功劳的话，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第二是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在导弹航天技术方面，那就是最初的老五院，以后是七机部、航天工业部，现在叫航空航天工业部，是这个领域成千上万科技人员的功劳，个人的贡献要是与党的领导和集体的力量相比，那是非常渺小的。仅就我的工作而言，也能完全说明这个问题。周总理、聂老总给我这个任务，我的办法就是依靠集体。记得那时，每个星期天下午，我就把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庄逢甘等几位总工程师，还有林爽同志，请到我家去议事，有什么问题，大家提出来共同研究解决。不同的意见要尽量发表，但议定的事都要执行。执行中发现有什么差错，要尽快改正。我们中国的导弹，就是这么干出

来的。所以成就是集体的，这包括航空航天工业部、国防科工委（那时叫国防科委）、各试验基地，还有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各部等有关协作单位。那时，叫全国大协作，各有关单位都作出了贡献。因此，今天给我的奖，说是第一名中国人得此奖。我说，要紧的是“中国人”三个字，这个“中国人”，应该包括中国成千上万为此作出贡献的人。

至于说到系统工程，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人都感到系统工程的重要性，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包括中国科学院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等。所以，就是系统工程理论方面的贡献，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国际理工研究所在授奖文件中所说的“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方面的贡献这段文字中，“中国”两个字最重要的原因，应该表彰的是中国所有对此做出贡献的人们。

另一方面，我要指出的是，韩叙大使代表我领奖的那一天是今年6月29日。就在这一天，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歪曲事实真相，对中国政府在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中所采取的正义立场和必要措施，肆意进行污蔑和攻击，并提出一系列“制裁”的措施。他们的这一行为，还有“美国之音”等的一系列表演，都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今天广播、报纸上说，

聂老总写信慰问戒严部队，信中也说到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现在国际上还存在帝国主义，国内还有一小撮阶级敌人，怎么能说没有阶级斗争呢？

当然国际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给我这个奖，表明他们还是友好的。美国的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就在1950—1955年期间，美国政府整我的时候，就有许多美国朋友安慰我，千方百计地给我解决困难，对我表示了真正的友情。直到最后，我们上船，要离开美国了，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岸上欢送队来送我们。这是我亲身感受的。我有一个很好的美国朋友，是威廉·西尔斯教授，几年前他到中国来，我去看他。他在住的地方看到不少美国商人，见到我头一句话就说，这些人来中国是要割你们肉的，你们要小心。他是美国人，但他提醒我们不要上当。这才是美国真正对中国友好的人。最近江泽民同志在接见我国驻外使节时讲，要两点论，即在对外关系上，既要讲经济，也要讲政治；既要讲友好，也要讲斗争；既要讲原则，也要讲策略。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要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左的口号，同时也要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要记住江泽民同志讲的两点论。

我们是搞科学技术的，但也要考虑经济、政治问题。我常和一起工作的朱光亚同志说这件事。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党和国家给我们一些科技工作

者重要的责任，要我们作科学技术参谋，这件事可不简单。那个时候，我们搞导弹、人造卫星，任务比较清楚、明确，反正就是要干出来，是具体干的问题，而不是要选择方向、途径的问题，大的方向、途径是党中央已经决定了的。但是现在搞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有专家委员会或专家组。我深感专家组长不好当，因为现在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竞争这么激烈，叫科技战，智力战。选择干什么、不干什么、怎么干，对这些问题专家出的主意要是差一点，国家的损失就大了。因此首席科学家的任务比我们那时重得多，复杂得多，要是科学技术战略家才好！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培养年轻的接班人，我估计这样的人大概需要200人左右，这200人可是关键。他们既要是科学技术专家，同时又要懂得辩证唯物主义，会用两点论分析问题，了解世界复杂的情况。这样的人设计出的方案才不会出乱子，才会出奇制胜。这是我们国防科委在周恩来和聂荣臻同志领导下，搞大规模系统工程，攻尖端技术的一点体会。科工委科技委的领导同志恐怕要扛起这个担子，我的年纪大了些，只能起国防科工委科技委高级顾问的作用。各位给我的鼓励我很不敢当，但我不泄气，还要尽其所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奋斗下去。（此文是钱学森同志1989年8月3日在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协祝贺他获得“小罗克韦尔奖章”时的讲话，载1989年8月8日《人民日报》）

目 录

我一定能回到祖国——记钱学森教授	(1)
赤子之心——记李四光教授	(10)
把一切献给祖国——记竺可桢教授 ...	(21)
活着是为了祖国——记华罗庚教授 ...	(32)
我的祖国更需要我——记茅以升教授	(42)
为中华图强而奋发——记苏步青教授	(52)
爱，献给祖国——记钱伟长教授	(63)
一往情深——记钱王强和何泽慧夫妇	(73)
使中国强大起来——记傅鹰教授	(82)
为了祖国更美好——记谢希德教授 ...	(92)
深沉的爱——记吴仲华、李敏华夫妇	(101)
祖国啊，母亲——记张文裕、王承书夫妇	(113)

回到母亲的怀抱——记化学家黄量 … (123)

祖国的女儿——记化学家陈茹玉 …… (131)

我是祖国的儿子——记苏鸿熙教授 … (140)

后记 …………… (148)

我一定能回到祖国

——记钱学森教授

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两天之后，大洋彼岸的美国合众国际社播发了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写的一篇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专稿说：“主持研制中国洲际导弹的智囊人物是这样一个人：在许多年以前，他曾经是美国陆军上校，由于害怕他回中国，美国政府竟把他扣留了5年之久。

“他的名字叫钱学森，今年68岁（按：应为69岁）。在这个名字的背后，有着一段任何科学幻想小说或侦探小说的作者都无法想象出来的不同寻常的经历。

“‘我宁肯枪毙他，也不愿放他回中国’，50年代的美国海军次长丹·金波尔说。……‘钱学森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金波尔对钱学森博士的才能的高度评价，已经被1955年钱获准离开美国回国以来的事实所证明。

“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中国才在1970年成

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现在，由他负责研制的火箭，正在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本星期四，是钱终生事业中又一个里程碑。在这一天，中国宣布，它将向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周围的海域发射一枚洲际弹道火箭……”

1955年10月1日清晨，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一艘巨大的轮船正迎着风浪开往香港。

一位世界闻名的中国科学家迈着稳健的步子跨出客舱，踏上甲板。阵阵海风，不时掠过他那宽大的前额。眺望水天一色的远方，他屈指一算，已经航行了15天。当他想到大洋彼岸就是亲爱的祖国，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那将会千百倍地缩短这次归来的旅程时间！

这位在异国他乡饱尝辛酸的人，就是钱学森。

此时此刻，钱学森正在思考着：怎样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再过一会儿，船上的全部华人就要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庆祝会了，他还要发言倾诉自己的一往深情呢。……

1936年初秋，获得博士学位的钱学森结束了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习，兴致勃勃地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这里有一位久负盛名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卡门当时是研究航空科学的顶尖人物，后来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钱学森来到

卡门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要求攻读博士学位。卡门当即建议钱学森转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深造。钱学森接受了这个建议，成为卡门领导的古根罕姆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在卡门指导下写了有关高速空气动力学方面的博士论文。他们共同合作，开始在人类喷气推进技术史上谱写光辉的篇章。

从1936年到1939年，钱学森在结束了三年的研究工作而取得博士学位后，留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他从卡门的得意门生进而成为亲密的同事，声望仅在卡门之下。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冯·卡门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与钱学森共同合作的。他们还共同创造了著名的“卡门—钱公式”。

“卡门—钱公式”全称为“卡门—钱学森公式”，又称“卡门—钱学森法”。这是由冯·卡门提出命题，由钱学森做出解答的。这个公式第一次发现了在可压缩的气流中机翼在亚音速飞行时的压强和速度之间的定量关系。

1943年，美国军方经过慎重选择，委托钱学森进行重大军事研究。同年11月，他和马利纳等人提出了一份《远程火箭的评价和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报告中提出了三种火箭导弹的设计思想。冯·卡门在同钱学森、马利纳讨论了这份报告后，决定附上自己的一份备忘录，一并送交军方，建议着手这项发展计划。对此，军械署希望加州理工学院着手更广泛的研究计划。

1944年2月28日，冯·卡门把拟订的新计划交给陆军军械署的技术部。这个计划被全部接受下来。为了完成这个计划，钱学森不断往来于五角大楼和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意识到导弹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向卡门建议，在美国设立一个“喷气式武器部”的新机构，集中研制导弹。他还建议成立一个学会来促进喷气推进技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钱学森的研究成果为美军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无法估价的贡献”。为此，他曾受到美国空军部的高度赞扬。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认为他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1945年，冯·卡门受聘担任了美国空军顾问团团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顾问团对希特勒火箭技术发展情况进行了考察。钱学森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曾因在二次大战期间对美国的火箭研究作出过重大贡献而成为空军科学顾问团的成员，并担任要职。为参与这次考察，钱学森被美国军方授予上校军衔。钱学森与冯·卡门一行考察了德国空军的秘密研究所和V-2火箭基地，详细地察看了研究设备，分析了技术成果，并且审讯了包括卡门的老师路德维格·普特朗在内的有关研究人员。

钱学森此行开阔了眼界。他所作的关于德国考察报告，获得了当时美国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的通令嘉奖。

1947年2月，经冯·卡门推荐，30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正教授——终身教授。此时，钱学森已经成为一位在火箭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专家，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进展。

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两年之后，钱学森于1949年9月又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喷气推进课程和对新的推进技术进行研究。他对于发展核能发动机的可能性深感兴趣，打算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实际上，他在这一年已经写出第一篇关于核火箭技术的出色论文，数十年后仍被公认是这个领域中一篇经典著作。

钱学森在事业上的成就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祖国的思念之情。1949年中秋节之夜，在加州理工学院校门对面的一个街心花园里，钱学森夫妇和庄丰干、罗佩森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共同欢度祖国的传统佳节。

年年中秋，今又中秋。然而，这个中秋节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后的第六天（10月6日）到来的。此时此地，钱学森和大家一起尽兴欢叙，表达对祖国的一往深情。不久后，他们就准备回归祖国。

正当钱学森和大家焦急地期待着1950年夏季

到来——一个学年结束，可以辞退工作的时候，朝鲜大地燃起了战争烽火。挑起这场战争的美国，国内正掀起一股疯狂的反共政治逆流，钱学森亦受到联邦调查局的无理盘查。1950年7月，军事部门吊销了他的参加研究的证书，使他无法再进行喷气推进的研究。

他前往华盛顿，到海军次长丹尼尔·金波尔所在的五角大楼办公室，汇报了他目前的工作状况，并严肃声明：“有鉴于此，我已经准备动身回国了。”金波尔听后大吃一惊。钱学森刚一离开办公室，便立即电话通知移民局说：“我宁可枪毙他，也不让他离开美国！”

1950年8月23日上午，钱学森一家乘飞机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刚一下飞机，移民局的一个官员就迎了上去，告诉他根据法律，不能离开美国。

在美国移民局这种无理刁难下，他只得退掉飞机票，又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从此，他及全家的行动处于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和跟踪下。与此同时，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他的全部行李，当发现行李中的板条箱里满满地装了800多公斤书籍和笔记本时，便硬说其中藏有机密，声称“这个狡猾的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毛的间谍。”新闻机构甚至造谣诬蔑说：一名“共产党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离开这个国家。9月9日，联邦调查局竟突然逮捕了钱学森，并冠以“企图运输机密的科学文件